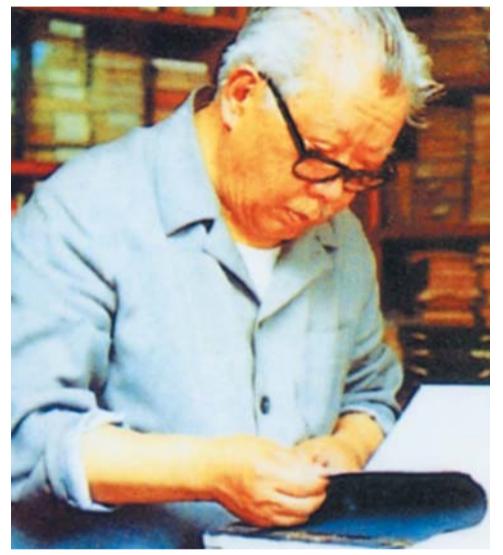


《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



李一氓先生

□卞文志

央视新闻“文博日历”近日播出了“海内孤本——草堂先生诗集存草堂”专题节目。据节目介绍，这本南宋淳熙刻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原二十卷，现仅残存六卷，共八十七页。据说它有三大“金贵”之处：宋代刻本、纸质古籍、海内孤本。

文博界有种流传很广的说法：“纸一千，绢八百。”意为以纸为载体的文物，可以保存的年限不过一千年，而以绢为载体的文物，最多保存八百年。这部纸质诗集流传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尤为可贵。宋代刻本，坊间曾传“一页宋版，一两黄金”，雕版印刷兴盛于宋，其刻印精工、流传稀少，故有“寸纸寸金”之说。据统计，目前所知海内外现存宋代刻本仅有十九部，成都草堂独占其三，仅次于国图，其中南宋刊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不见于海内外公私目录著录，意味着全世界“仅此一本”，是名副其实的“海内孤本”。

草堂先生重归草堂，离不开一位“护宝人”，《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得以完善保存，不得不提到它背后的“护宝人”李一氓先生。

李一氓先生1903年出生于四川彭县（今四川成都彭州市），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是诗人和书法家。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追求革命真理。作为生于彭县的四川人，李一氓对家乡充满了热爱和眷恋之情。他一直关心杜甫草堂的发展与文物收集，并身体力行，为草堂留意和代购与杜诗相关的古籍版本、外文杜诗等相关文物资料。

1964年夏，李一氓来到北京中国书店，发现有两册宋版书《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摆放在书架上，他欣喜若狂，立即为杜甫草堂代买下，并对其进行了详细地考证著录。这部诗集“书中匡字缺笔、慎字缺笔”，约可断定为南宋淳熙刊本，依纸质字体约可断为建阳刊本，李一氓用“浮签”在书页上方加以备注。

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得知此事之后，曾经找到李一氓，希望能将此本保存到北京图书馆。作为四川人，又在年少时期多次流连于杜甫草堂的景色中，可以猜想，李一氓无论是对

家乡的热忱，还是出于对这部古籍的考量，都希望它能回到风景如画的成都浣花溪畔。李一氓获得此本后，请了当时的四川同乡和北京文化名人在上面题跋，包括朱德、陈毅、郭沫若等。朱德在古籍上写下：“成都杜甫纪念馆得此书，可为所藏杜诗带头。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五日。”后有“朱德”印。郭沫若题写：“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素所未见，殆是海内孤本，虽残卷，良可珍惜。藏之草堂，尤得其所，可谓草堂先生重归草堂矣。”有了名人题跋，也指明了《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的归处，“草堂先生”归成都杜甫草堂所有，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书名中的“草堂先生”和“杜工部”，指的都是诗人杜甫。南宋雕版印刷开始兴盛，当时的商人就把杜甫的诗收集整理，然后“出版”了这套《诗集》。八百多年过去了，这本书是如何保存下来的呢？这就要提到一个地方——皇官内库。皇官内库是明清时期的官廷档案库房，既是“档案馆”也是“图书馆”，收藏了明清两朝的各种文件，只要写了字的东西都会收藏在里面，另外还收藏了古今流传下来的、众多有价值的旧书古籍，而这本南宋淳熙年间的《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自然也在其中。

1898年，由于皇官内库年久失修，造成房屋多处漏雨，于是光绪皇帝下令，将大内库房全面修缮一番，但不巧的是，在工期内遭遇了八国联军入侵，导致工期暂缓，还造成大量资料丢失。1909年，皇官内库一直都没有修缮完成，为了保护里面几百万件的文字资料，就将内阁大库的所有资料进行转移，在此过程中又造成了大量旧书古籍的丢失，再加上之后造成了“八千麻袋事件”，于是短短几十年间，数以万计的旧书古籍从皇官大内流出，零零散散流落在民间。而《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正是当年流出皇官的珍贵古书之一。

如今耳熟能详的杜甫诗句，通过古籍代代相传才流传至今。“草堂先生”诗作共计1400多首，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得以流传，粉丝们贡献了很大一份力，北宋文学家黄庭坚就是其中之一。他曾手书杜甫两川夔峡诗碑三百余方，不过杜诗流传最普遍的方式却是刻本。自宋代以来，“杜粉”们编纂的各种集本达上万册，最为珍稀的便是这部南宋淳熙刻本，诗集尊称杜甫为“草堂先生”，彰显了杜甫与草堂的不解之缘。

公元760年春天，为躲避安史之乱来到成都的杜甫，在浣花溪畔修建茅草屋，这便是如今杜甫草堂的前身。杜甫目睹人民罹难惨状，发出了愤懑的慨叹之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对于百姓的苦难给予了无限同情，他的理想燃起又破灭，消散又聚集。搭建草堂的茅草被狂风卷走，他拄着拐杖在风中寻找茅草，归来后一边倚杖叹息，一边伤感追问：“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即使生活穷困，杜甫也从未想过独善其身，而是一心要兼济天下，这也是后人对他称之为“圣”的原因。

杜甫的诗歌在内容、风格、字句锤炼等方面都有很大开创，他扩大了律诗的表现范围和表现力，诗作精于炼字，变化丰富，影响了后世一大批诗人学者。杜甫的诗歌寄寓了他的家国情怀、政治思想，寄寓了他的欢喜与悲怆。诗歌是他黑暗生活中的火把，将他的周身照亮。而另一处的火光和温暖，则来自于他的家庭。爱情与亲情是中国古代诗歌作品中的一大主题，诗人们写闺阁幽怨，男女情爱、悼亡哀思，但很少有人像杜甫一样描写普通夫妻、家庭平时琐碎的生活。而杜甫则将这些都写入了自己的诗作中，他的诗聚焦于农民的贫困潦倒、士兵的无家可归、征夫的挣扎绝望，生活是真实而具体的，苦难也是。

□赵桂琴

话说癸卯之年好客山东有件大事不得不提：淄博烧烤话题雄踞网络热搜月余依旧热度不减，全国各地的游客以好客之名，不以山海为远纷纷前来赶赴令食客着魔的烧烤之约，只为体验一把传说中的灵魂三件套——烤炉、小饼加蘸料。淄博烧烤火得一塌糊涂的同时，难免引人发问：中国人为何如此酷爱烧烤？

《诗经·小雅》中的一首小诗《瓠叶》或许可以为我们揭开谜底。“幡幡瓠叶，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尝之。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酬之。”这首描述普通人家热情待客的小诗在《诗经》中并无新奇之处，却表现出中华民族悠久的饮食文化传统，以及礼仪之邦所独有的尚礼民风和谦虚美德。

诗中“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描述的正是烧烤兔子头的生动场面。虽说现代城市烧烤号称“万物皆可烤”，但跟诗经时代的先人相比，食材未免受限。

《瓠叶》中的主人尽管家境贫困，家里来了客人，依然有他的热情待客之道：去田野采一把瓠瓜叶做菜煮汤，再逮上一只野兔烧烤，便是极好的下酒菜。手脚不利索撵不上兔子的，守株待兔也能偶有收获。可见先秦时期人们尚未萌发掌控自然的野心，人和自然也是和谐共生其乐融融。

那么华夏大地第一个教给大家吃烧烤的是谁呢？《韩非子·五蠹》中记载：“民食果蔬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国人取火的发明者燧人氏（风姓燧明国人），在今河南商丘一带成功钻木取火，并教人吃烧烤熟食，从而结束了上古之世先人们茹毛饮血的历史，开创了华夏文明。燧人氏也被后世奉为“火祖”，位列“三皇”之首，尊称“燧皇”。

之后在华夏饮食史上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烧烤食物是先民们的主要饮食方式，直至商周时期。这倒不是先民们对烧烤情有独钟，而是受当时的烹调水平和烹饪工具所限。在古代的美食家们还没有研发出炒、烧、蒸、炸、爆、煎、煮等烹饪手法之前，烧烤是祖先能掌握的将食物整熟的最简单的方法。

《诗经》中出现的烧烤手法有炮(páo)(以泥裹带毛肉而烧之)、燔(fán)(去毛在火上烤)、炙(zhì)(用叉子叉着肉在火上烤)、烈(把肉串起来烤)等，如载燔载烈(《生民》)、炮之燔之(《瓠叶》)、或燔或炙(《楚茨》)、燔炙芬芬(《鳧鷖》)，“燔炙”就是烧烤肉的统称。

宋代当是古代烧烤的鼎盛时期，生活在汴京城中的文学家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如

此描绘美食之都汴京的盛景，“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其中烧烤美食他提到了十多种，当时龙津桥“州桥夜市”的热闹场景大概和如今的淄博八大局烧烤广场有一拼。

周紫芝在《竹坡诗话》的记叙更是令人咋舌，“东坡喜食烧猪，佛印住金山寺时，每烧猪以待其来。一日为人窃食，东坡戏作小诗。”因为苏东坡喜欢吃烤猪，好友佛印本着“酒肉手中过，佛在心头坐”的本心，便常做好了烤猪肉等苏东坡来吃，有一天烤好之后居然被人偷吃了，这便是苏东坡《戏答佛印》诗中“远公沽酒饮陶潜，佛印烧猪待子瞻”的由来。虽说寺庙中的破戒美食被窃不可细想和深究，却也说明了烧烤美食拥有令人难以抗拒的魔力。

宋代陈造认为羁旅中吃了“米饭荐烧猪”后，即可进入“饱足仍酣睡，眇睨人间世”的仙境境界了(《旅馆三适》)。而金代的元好问病中想念的居然是烤猪肉，“止酒嗟何及，烧猪本不图(《病中》)”，若是曹操穿越到宋代，怕是要写下“何以解忧，惟有烧烤”的诗句了。

虽然那时还没有辣椒面，但西汉时出使西域的张骞已经把胡椒、孜然、小茴香带回了中国，烤熟的肉串撒上胡椒、孜然，也是人间至味。

至于辣椒面，则还要等到明朝万历年间中国辣椒的老祖母远渡重洋来到东南沿海地区，作为观赏植物靠姿色取悦达人显贵百年后，于康熙年间才以佐料身份隆重登上国人餐桌，并轻松征服中国人的味蕾，逐渐雄霸调味品的C位。时至今日，辣椒在四川湖南等地域地位甚至等同主食。

可以说，烧烤伴随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从而也挖出了何以一个稀松平常的淄博烧烤便令全国吃货们如痴如醉、似癫似狂的深层根源：老祖宗当年以烧烤食物充饥果腹的漫长历史已深深铭刻入我们的基因记忆中，之后一旦有诱因出现，体内最原始的本能欲望即被唤醒。如此这般便能够理解为何再文雅的人面对烧烤也会忍不住热血沸腾，丢掉各种斯文伪装，化身大快朵颐的老饕了，只缘这是祖先遗传下来的人之本性啊！

然世间烧烤有百媚千红，为何国人独爱“淄博烧烤”这一种？我们回头来看《小雅·瓠叶》，陈子展在《诗经直解》中直言作者是一个穷困之“士”或没落为庶人的自由民，何出此言？诗中待客的餐桌上没有《周礼》中贵族们讲究的“五谷”(黍、稷、麦、菽、稻)“六牲”(马、牛、羊、豕、犬、鸡)等，下酒菜只有葫芦叶和兔子头。但菜肴粗陋可以用热情来补，饮酒礼仪中的献(主人向宾客敬酒)、酢(客人向主人回敬)、酬(主人再次敬客人)的礼数一个不少，主宾之间觥筹交错，式燕以乐的欢愉程度丝毫不逊珍馐美饌满席的盛筵，甚至更加情真意切。这和淄博烧烤摊上“下里巴人”的集体狂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短史记】由《诗经》探寻烧烤的秘密

【文化观】寸纸寸金，这本诗集缘何「金贵」

投稿邮箱:qlwbxujing@sina.com